

書叢民三

國中日今與爭戰平和

著生芝曾

行印社刊週民三

版權所有

實價國幣三角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出版

著
者
曾
芝
生

出
版
者
三
民
週
刊
社

印
刷
者
三
民
印
刷
所

發
行
處
三
民
週
刊
社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和平戰爭與今日中國

目錄

一 和平戰爭與中國經濟	一
二 和平與民族主義	一一
三 和平戰爭與中國統一	二〇
四 和平防共與復國救黨	三〇
五 戰由國民黨戰和由國民黨和之事實與理論	四四
六 從抗戰建國到和平建國	五八
七 中國今日之民主與科學運動	六二

和平，戰爭，與中國經濟

恢復和平與繼續抗戰到底有着怎樣的利弊，這不是意氣和感情所能判斷的。

近代的戰爭，尤其是國際間進行的大規模戰事，勝負之數，常不能決之於敵愾心之強盛，而決之於國與國之間經濟力量強弱的差異。中日戰爭，自開始至今已經兩年多了。姑無論認為「最後勝利，終歸於我」或失敗必屬於我」這一類信念之依據如何：我們應該就中國本身經濟的結構與實質來分析一下，究竟和平有利；還是繼續抗戰為得計呢？

就中日一般的經濟基礎而論，日本是工商業發達了的國家，科學技術有高度的水準，跟着是國家組織的嚴密。科學技術應用到戰爭方面所特着的現象，是軍需工業發達，戰鬥工具堅強，軍事組織與交通運輸便利；反觀中國，始終還停滯在農業生產而沒有工業化的半殖民地經濟階段，工業落後，科學技術不發達，國

家組織鬆弛，表現到國防方面的，是軍需工業沒有基礎，近代戰爭的新式武器只能靠國外的供給，而且因為缺乏科學技術的訓練，即令取得了此項供給，亦有難於運用之虞，在這樣形勢之下，勝負之數，本不待蓍龜。這一點，早已爲有識之士所見及，茲不贅述，茲篇所論，乃欲專就中國經濟的實質亟需和平而不宜繼續戰爭的事實加以闡明，藉供舉國人士的參考。

第一如前所說，中國是停滯在農業經濟的半殖民地國家，在外國商品輸入與國內原料品輸出的不等價交換的損失之下，以及外國直接輸入工業資本的剝削（如在內地投資設立工廠）與乎輸入金融資本控害民族資本發達的狀況之下，中國固有的社會經濟基礎破壞，新的近代工商業社會經濟基礎難於建立，在這種環境之中，最正確的經濟策略，是要利用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與資本，使國家工業化，逃脫不等價交換的損失與外國工業直接的剝削，從而漸次使民族資本發達以擺脫外國金融資本的控制，要這樣，纔能挽回這半殖民地國家的命運。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但這一事業，需要國內的休養生息，需要國際間的和平。沒有和平的保

障，即令見已經工商化了的國家都要破產，更何望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能成功這樣的偉業！所以必須在政治上外交上努力取得這種保障，未失時本該極力保持，既失時應則極力恢復，否則不但不能挽救半殖民地的命運，反而有使中國淪入完全殖民地的危機！

第二是農村經濟的破產，不能任戰爭延長，使其由破產而致滅亡，使一班農民由流離顛沛而填死溝壑。中國的都市經濟，是外國商品，工業資本，金融資本的附屬物，牠是沒有自主性的。通過資本主義國家自設的洋行與其卵育下的買辦行幫，工業商品價格時在提高，農業原料品的價格常被抑低，中國因為未能工業化，對外貿易主要是農業原料品與工業製造的交換，其間價格差額頗大。這種差額的損失，多是農村中的農民蒙受。這是農村破產的外來原因，其次是多年來的內亂，水利不修，兵災迭見，超經濟的強制剝削（如橫徵田賦雜捐之類）使農村經濟崩潰，農民幾於無法生存。中國的都市經濟既不能支持長期戰爭，貧困的農村經濟，事實上更難作長期抗戰的基礎。而且與先進的工業國家作戰，要靠動員

落後的農村的物力財力來支持，姑無論是否有此力量，即在散漫遲紆不易結集的這些客觀存在的困難之下，誰也不能不發生懷疑。所以爲着使農村尚有復興機運，運用外交，乘機覓取有利的和平，以保障將來的建設，正是客觀的經濟條件所迫切期待的事業。

第三是依據西南與西北的經濟基礎，亦不能從事長期抗戰，現在的當局，常以建設西南西北作抗日復興的基礎相號召，實際上中國一般經濟落後，而西南與西北區域則較東南與沿海一帶尤遜。事實上應該覓致和平，努力建設，以爲後圖，但却難據以作即此抗戰下去的經濟基礎。譬如廣西貴州各地，遑論工商業的落後，（僅有極粗劣的家庭手工業，農家副業式的手工業與小型的工廠手工業，新式工業不多見商業則帶原始性的市集或墟市尙極普遍）即舊式的農耕技術，亦尙未發達，貴州西部北部南部，廣西北部西部，尙多木犁火耨，荒地遼闊，耕地稀少，至於西北狀況，教西南尤遜，這種地域的建設，在承平時期，尙爲極艱巨的工作，今欲「一面抗戰一面建設。」而反過來馬上欲拿作長期抗戰的根據，事

實上決辦不到。客觀條件的限制，需要努力取得和平，並於和平取得之後加緊建設，以作為將來新中國更生的經濟根據地，這才具有希望。

所以一般的中國經濟基礎或專就西南經濟的現況而論，和平的恢復，有着極重大的價值。讀者至此，必定要懷疑，中國經濟的本質既如此微弱，為什麼戰事發生以來，中國可以抗持到兩年以上呢？這一點，我們要就列強國際間經濟關係的鬥爭與衝突來解答。

如前所說：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是工商業落後的農業經濟地域。牠是列強的商品消場原料市場，在這裏，列強間各種鬥爭的實相都顯現出來：工商業經營特權競相攫取，原料與商品市場範圍的互相排斥，金融貨幣權的彼此爭霸；，跟着是國際政治外交的鈎心鬥角，甚至有時還各自以武力為後盾以相炫耀。所以當法幣制度完成，中國幣制聯繫到英磅集團的時候，日本的砲聲也跟着響起來了。經濟的鬥爭失敗以武力來硬幹，正與經濟的鬥爭成功反對以武力來侵襲，動機是一樣的。即是都為着他們本身的經濟利益。日本猛烈地以武力來侵略中國

與英美等的願意以財政來支持中國的抗戰，其出發點都是如此。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衝突，中國暫時取得了財政上的外援，更由此而獲得了外國軍需的供給，這樣中國的抗戰支持了兩年以上。雖然抗戰的能夠支持還有近年來民族意識發達與國內統一加強的他種因素，但這種外鑠的經濟助力，是不可否認的決定成分。

兩年以來，既然靠着外來的經濟助力支持了抗戰，以後是否可以繼續依賴外力而且繼續抗了下去呢？如果外來的財政支援可以源源不斷，軍需供給如水之有源而不枯竭的話，自然是可以的。但無如事實上決不會有這樣的甜頭。比如就英國而論，爲了怕日本獨霸東亞侵害牠在遠東的經濟利益起見，可以財政援助，支持中國抗戰，如以前的貸款，支持法幣，穩定外匯，便是實證，但是同樣的爲着維護他在遠東的利益起見，看到維持法幣與穩定外匯將是一個無底的損失的深淵的時候，倫敦方面便又要退縮起來了。貸款的遲遲不付，繼續支持法幣的躊躇不決與乎這次英日東京會議的對日圖謀妥協與以後的多方妥協，都是可能的。所以

任何國外的經濟援助與否，只是爲了牠自身的利益。我們可以依據中國本身的經濟條件來打算盤并利用這種外來的經濟助力以取得有利的條件。但如拋棄客觀存在的本身經濟條件不計而專憑外力以爲轉移，則在外來助力的一進一退之間，中國所蒙受的損失，將至不可言說。

戰爭是決非兒戲的事，牠可使強國變弱，弱國變亡，戰爭是破壞的惡神，歷史上沒有從事戰爭的國家不陷入府庫空虛，民生凋蔽的。戰勝國可以從戰敗國身上榨取以爲補償，猶往往所得不如所失，因而疲憊不振。戰敗國所受損失之嚴重，則更不待言，數十年來建設之不足，一旦戰事摧毀之有餘，這是不可不慎重的。

抑尤有進者，中國的經濟及基於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力，固不足以言支持長期戰爭，但經濟薄弱國力不充的國家欲尋求和平的保障，亦決非易事。「戰」與「和」在中國客觀存在的經濟社會政治條件之下，都成爲一種艱鉅的事業，「戰」與「和」的是非，不在於「和」「戰」的本身，需要戰或需要和，可以戰或可

以和，均須就客觀的經濟社會政治條件能容許與否來作決定。然而在中國，我敢說，和平的獲得有莫大的價值。取得光榮的和平以保障將來的建設，應爲一班有識之士所共同邁進的事業。

然則如何纔可以取得光榮的和平？在什麼條件可以從事和平的奠定呢？

前者我們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說，第一是要促起日本朝野的注意，使他們歷次所宣稱的「中日共存共榮」的主張，要真實的在經濟的實質上符合於「平等互惠」的原則。經濟上平等互惠的合作，可使中日兩蒙其利，而有利於東亞的永久和平。反之日本如果以戰勝者自居，從而以政治的軍事的手段，壟斷資源，獨霸工商業市場以及各種交通運輸事業，使中國喪其經濟生存的命脈。則和平是不可能。而且後患之來，不堪設想。日本縱然可在軍事上一時加以控制，但無窮盡的中日間之紛擾，中國固然因此衰亡，日本在經濟上亦非患貧血症以至於竭蹶不可。這是要促起日本朝野明達士人的嚴重注意而加以真誠的諒解的。其次是要提醒國內有識和愛國之士，使知中日間長期的爭鬥，只是兩敗俱傷，日本的經濟基

礎固然不及英美，但究比中國爲強。中國的長期抗戰，姑假定其爲可能而且可以促起日本經濟的崩潰。然日本崩潰之時，中國早已枯竭無餘了，所以最好是取得日本的諒解。在科學技術上借助日本，在經濟上彼此平等互惠，由經濟上的平等互惠，消除政治軍事甚至外交上的紛爭。這樣，真實的和平才能有望。

關於後者——究竟在什麼條件之下可以奠定和平呢？——大凡結束戰爭奠定和平，除了兩個國家打到一塌糊塗作不結束而結束之外，一般總是有政治軍事經濟上的條款的。現在姑勿論近衛的聲明是否可作和平談判的基礎，或由這一基礎談判出來的條款是否爲亡國的條款以及日本是否真實履行諾言這一類問題的實際性如何，我以爲一個大的原則，是任何條款，均須在使中國經濟，將來能夠發展而日本也可得利益的前提之下簽訂。不然的話，則在中國方面，一班人均將認爲與其慢性的貧血而亡，不如痛快的抗戰而死。和平是決難獲得善果的。至於政治軍事條款的簽訂，也須在上述的前提而且爲保證上述的前提之下進行。因爲經濟政治軍事是互相繫聯着的，如果政治軍事的條款，使中國喪失了領土完整與國家

主權的時候，則他沒有法子保證經濟方面將來可以發展，則一般均將認為不如繼續抗戰，和平的也是決無善果的。

所以時至今日，真正平等互惠與真正共存共榮的和平，就中國經濟甚至於就日本經濟都是一件迫切需要的事業，這事業真正的完成，並不比兩國間進行戰爭事態為極容易，牠須要兩國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兩國工商實業家的推誠相與，兩國軍人間的化除仇恨，以及兩國民衆的純真親善。沒有互相間誠心誠意的諒解，沒有坦白勇敢公平合作的決心，則一時的休戰言和，或可由強制而致，但真正永久的有利兩國的和平，則決無倖致之理。

和平與民族主義

現階段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發揚與民族地位的恢復，實以能取得和平的保障為唯一條件，所以和平運動之於今日是一種富於建設性的政治運動。

一般人通常以為民族主義與和平是不相融洽的，一談到民族主義，總與「尙武」「尙鬥」的軍國主義或狹隘的國家主義等一類觀念混同，其實這是重大的錯誤，要糾正這個錯誤，第一要將自次殖民地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所要求出來而為先 總理畢生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從基於某種種族或國家觀念而以侵略為目的的民族主義區別出來；其次是要就中國數千年歷史條件所養成的優美的和平道德加以深刻的認識，使其在認識上別於野蠻好鬥的劣等根性。要這樣，才能明瞭和平與民族主義之互相依繫，更進，才能澈底明白現階段和平運動與恢復民族地位的客觀需要。

數十年來，中國政治經濟蒙受列強的侵略，已經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這種地位，總理會定稱爲次殖民地（民族主義第二講）。在失去了獨立自主地位的次殖民地國家中，欲從社會政治經濟的建設入手以求民族地位的恢復，必須要國內的和平統一，才可從事建設，更須要國際間的和平，才可保障國內的建設。

總理生前的扶病北上，冀能和平統一國內，以及提倡東亞和平，指示出中國的建國復興需要日本的和平諒解，甚至在民族主義中還稱道俄國革命後的和平主義，都是一貫的主張。他看清了中國所處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知道只有求得國內的和平統一與國際間的和平保障，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復，所以民族主義思想的骨幹，可以以和平二字括之，在民族主義演講中，對於和平主張孳孳不倦地提及，譬如對英國領事解釋所以不主張參戰的理由說：

「……我們因爲已經多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才是真和平，我希望中國永遠保守和平的道德，所以不願意加入這次

大戰。」（民族主義第四講）

對中國愛和平的美德，也常加稱道：

「我們辛亥革命推翻滿洲，……所以流血不多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愛和平，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中最愛和平的人。我從前總勸世界人要跟上我們中國人，現在俄國斯拉夫民族也是主張和平的。這就是斯拉夫人已經跟上了我們中國人。」（全上）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來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民族主義六講）

提倡國內國外的和平使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在和平保障之下能夠從事建設，

這是恢復民族地位的要道。所以 總理接着便說：

「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恢復。」（全上）

和平的精神，不僅爲保障中國建設恢復中國民族地位的要素，而且在總理學說及其政治道德思想的體系中，牠又是從民族主義發展到世界主義的橋梁，這是與企圖以武力統一世界的軍國主義絕對不同的。總理曾明白曉示由民族主義到世界主義的大道，他說：

「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爲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要退步。至於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英國話所說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打得的爲有道理。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爲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我們保守這種精神，擴充這種精神，是用什麼做基礎呢？是用民族主義做基礎。……」

有了基礎，然後才能擴充，所以我們以後要講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民族主義四講）

總理最高的政治理想，是以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統一世界，共進大同，這事業從恢復民族主義做起，所以又說：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民族主義第六講）

在上述 總理的遺教與他燦爛光輝的思想體系中，我們可知和平對於一個殖民地國家之可貴。中國民族地位之恢復以及將來由民族主義進展到世界大同都要循由這條大道。然而現在却失去了這個寶貴的東西，歪曲了這條康莊大道，中日雙方輕啓戰爭，中國的民族國家陷入了悲慘與破壞的途徑，日本的民族國家也墮入惶杌不安的深淵，誰實爲之呢？在中國則係一班謀國不老成與未能深切了解總理遺教與中國客觀存在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者之繆誤，在日本則係黷武主義與

侵略主義者之作祟。時至今日，應該是兩國朝野人士澈底明瞭與誠實諒解的時候了。

關於日本方面，自需日本朝野人士深切了解黷武主義與侵略主義之有損於中日雙方，而誠實地對於中國建國復興的偉業加以諒解，以求兩國間的互惠平等與共存共榮。其在中國自己，則我們要求國民沉着容忍，認清楚自己國家民族所處的地位，從而求致和平，并循由和平的道路以達建國的豐功偉業。

以上所論，是就總理遺教與中國次殖民地國家的客觀條件抽象地指出和平建國的方針與民族主義完成的關鍵。現在我要進而分析中國客觀存的社會經濟政治之形相，使一班人民更能了解和平運動與完成民族主義的聯繫。

第一是中國工商業的未能現代化。沿海以及內地發達了的商埠，實際只是外國工商業及其資本的結集，民族的工商業與資本沒有佔着大的比重。工商業未能發達，內地的交通運輸以及交通運輸的工具與技術亦均落後。各地的經濟不能有繁密的聯繫，以至形成一個個互相隔離的經濟區域。這是從清代中央統治力量失

去後形成近來軍人割據局面的經濟背景，軍人的割據與紛爭之層見迭出，某一割據區域與另一割據區域之間甚至一省與一省之間的關稅壁壘之存在，鈔票之各自發行，地方財政之擅自挪用，反過來又催殘並阻礙着國民經濟與民族工商業及其資本的發達。近幾年來雖然法幣制度確立，內地的交通如公路鐵路運輸都有着驚人的發展，中央的權力亦見膨大，各地加緊了經濟的聯繫，統一之勢形成。但法幣制度要靠英國的支持，而交通道路與運輸的進步，却大多是軍事與政治的作用居多。真實自有的經濟力量與經濟基礎並未鞏固，這正待發展國內產業促進近代工業以求充實，無如此一機運方興，遽然失去中日間的和平，引起兩國間的大戰。遂使建國的事業有半途墮敗之虞，我們要知道，戰爭祇有破壞，兩強之間尚不容輕啓，何況弱國對強國呢？譬如歐戰時的德國，軍事上始終是一個戰勝國，但戰後經濟的破壞程度，是我們所知道的，以德國之輕重工業以及近代的科學技術均有深厚基礎的國家，猶歷二十年至今自而始復興，我們今日一味的抗戰而不講求和平睦鄰之道，則大破壞之後，五十年後亦難有昭蘇之望，這是老成謀國的

人們所應切實注意的事實。所以尋求和平，用和平的保障來保存國家民族的元氣，進行經濟的復興，實為恢復民族國家地位的要着。

第二是社會政治組織的雜亂陳腐，官僚氣習的深厚貪污卑劣的盛行，駢枝機關的敷衍繁雜，中央與地方政治機構的不相適應，以及其他不健全的地方，都充分地在这次戰爭中表現出來。這指示出中國無論中央與地方以至於鄉村下層的社會政治組織，都沒有走上現代國家的道路。都不夠應付任何種國際戰爭。這些缺點，自抗戰發生已來，深切為一班人所共見，因而一班論調，多舉張要改革社會政治機構。抗戰以來，一些大小政治機構的變亂紛紛，由此而起。但在抗戰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政治機構的不良，在戰爭繼續狀態中決得不到根本的革新。已淪陷的區域無從着手革新，僅剩的後方則充滿着流離轉徙的難民，呻吟呼號的傷兵，徬徨惶杌的官吏，東遷西落的機關團體，只有不可計數的損失和犧牲，何從談到安定與整理？所以就社會政治的機構而論，只有取得和平的保障，將戰事發生以來表現的各項缺點，逐一加以廓清，中國始有走上現代國家的可能。否則國

家民族的前途，將陷於不可救藥的紛亂，遑言社會政治的改革？

由此可知和平運動，除了依據總理民族主義的真精神出發之外，實際是由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等客觀條件所要求出來的救國救民運動。不了解中國客觀存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一味盲動抗戰的人，淺識的血氣者流認為這是愛國忠勇之士，而深識沉毅的人們，則將認為這是民族國家的罪人。

和平戰爭與中國的統一

很顯然的，在中日戰爭未發生以前，中國的內部有一個重大的矛盾，這矛盾造成中國不想抗日而終於抗日想半途言和而終於不能言和的局面。

事實是這樣的：當時中國的內部形勢，是一方面趨向於統一而同時也包含着地方軍事政治離心勢力的存在。中央的勢力龐大了，地方性的軍事政治勢力感到危殆，於是趁華北華中日軍橫恣之時，高揭抗日倒蔣或抗日必先倒蔣的旗幟，這是一階段；西安事變後，蔣先生被劫持而趨向抗日，這時由抗日倒蔣變成擁蔣抗日，這又是一階段，但無論抗日必先倒蔣也好，或擁蔣抗日也好，在地方性的軍事政治勢力的立場看來，借抗日之名自力倒蔣與引起日本軍事進攻用外力消滅蔣的勢力以便私圖，其目的初無二致，其在蔣的方面，則為維持自己與軍事勢力政治地位起見，也需要抗日的招牌來穩定其控制的權力，地方軍事政治勢力固然

想藉抗日來倒蔣，蔣也正企圖挾中央用抗日來消滅地方勢力。在這樣的一個矛盾之上，抗日的聲調響亮了，一個說抗日，一個便加上到底；一個說犧牲，一個便言焦土。結果是欲和不和，不打也打，拖泥帶水，以迄今茲。至於當時對於國家民族的現實地位怎樣國家的經濟財政情形怎樣與國家的國防軍事政治是否可以應付一個強鄰的這一類問題，都不經心，縱有明白知道的，但因為有上述的矛盾存在，結果也只好不顧及了。

戰爭——尤其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是何等重大的事情！牠可以滅族，可以喪邦，可使數百年的建設毀於一旦，也可使千萬人民亡于一朝，不就國家民族的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的實質及其所處地位來作估量，只憑上述矛盾的一些動機發動戰爭，使建國的大業，半途而廢，這不能不使老成深識的人們，痛心疾首！如果另一事實是這樣；和平不能獲致，戰固亡，和亦不能不亡的時候，那末即便我們主張和平的人亦不能轉向抗戰而認為與其和平而亡不如抗戰而死，但現在客觀的環境轉變了，兩年來的抗戰成績，使日本覺悟武力侵略之非計，而殷切

地盼望中日和平，中國朝野人士在這時便應加以深重的考慮。

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民族，牠的唯一國策，是和平建設。和平可能時，是竭力的維持和平以保障建設。和平萬分不能保持而必須出以戰爭抵抗時，牠的性質也決非侵略性的，仍是以戰爭來恢復和平確保以後的建設為目的，這是 總理畢生所倡導的政策，這和平建國的精神，可以說是貫徹三民主義與 總理思想的全部，現在抗戰的結果，已經促起日本的覺悟，據日本當局的聲明與客觀環境來看，和平已可獲致，而且領土主權也可保持，那末根據次殖民地的客觀需要與總理和平救國的主張，我們應以抗戰的精神和魄力來爭取光榮的和平，因為只有這樣，纔能以和平建設代替戰爭破壞，才能使次殖民地的復興機運在和平保障之下再度的孕育滋長。

和平與抗戰的本身並無所謂是非的，主張和平的與堅持抗戰的，只有就中國民族國家所處的國際地位內部社會經濟政治的實質才能判斷他們的正確與否，一說到主和，便是漢奸；一說到抗戰，便是志士，這如果不是劫持抗戰以便私圖者

的說話，那實在是一個缺乏政治訓練的浮躁意氣的民族缺點。這缺點如果不糾正，仍然是國家民族的隱憂。因為在這種氣氛之中，老成謀國有先見之明的政治家，常常得不到羣衆的擁護，甚至于不敢開口，而一班意氣沒有爲理智駕御的燥浮之徒，反能一唱百和，貽誤國事，迄至濁流滔滔大錯已成之後，纔能省悟，甚至至此猶不省悟，然而國家民族的元氣生機，卽在這遲遲省悟或永不省悟的人們手裏斷送了，平心靜氣的說；這次中日戰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居心挑撥，人民陣線派的無知狂吠，及其他方面輕燥意氣的喧嘩，汪先生的主張老早可以實現，而蔣先生也並不會被迫而必須發動戰爭的。現在已經水落石出了，鐵一般的事實將無情的打擊這一班有意的無意的輕燥禍國之徒與自號爲民族國家的前衛的淺薄份子，同時鐵一般的事實，也將訓示我們忠實勇敢的同胞以一條正確的道路：卽是要將意氣熱情寓於理智之中，要將輕燥浮躁控制於深沉果毅之下。近代國民公民的私的行爲標準應該如此，而對於國家民族大事參與尤應如此！如果同胞對自己對國家民族達到了這個行爲的實踐標準的時候，那末我們的國家民族現在雖然殘

破，然而復興重建的希望正猶春氣之蓬然，我們無須乎悲觀與頹喪！

於此，有一問題，應揭櫫於愛國同胞和有識的朝野人士之前的，即是和平戰爭與中國統一問題。

如本文開始所說的，這次的中日戰爭主要的內在原因，是統一勢力與離心勢力的矛盾衝突，假使真的統一了，這次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第一是蔣先生不需要對外強硬來維繫內部，很有可能的與日妥協和平，以保障未完成的建國偉業。其次是日本知道中國真正有了統一，也決不會貿然無忌地進逼，東亞的和平仍可保持，中日兩國也不會掉入互相破壞與捏杌不安的深淵裏去。所以統一之於和平與戰爭，實具不可分割的聯繫。

更進，我們對於今後的統一與和平戰爭之於中國前途，具無窮的關切，因為這是中國以後興亡盛衰的樞紐，在此我要虔敬地加以分割，以貢獻于國民之前。

第一，我們要問；假定繼續抗戰下去，將來于「到底」了之後，統一之于中國，是不是可以保持一個健全的實體呢？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統一往往是以某

一內在的外在的勢方爲中心而漸次發展的。嬴秦西漢的統一是以關中漢中爲基礎的勢力成功的，光武的統一是以南陽與其他各地的大族勢力河西的經濟基礎發展出來的。司馬氏的統一是承借曹魏勢力由大族拄支起來的。而元清的統一，却是由於一個強大的外來民族勢力的結果。我們承認：蔣先生的勢力是現代中國一個可資以統一的中心勢力，但不幸他自己把牠斲喪了。由於容忍共產黨，使她可以自由發展紅軍與蘇維埃的勢力，這便相對地減弱自己的勢力，由於不顧一切地延長抗日戰爭，耗費國力已力，這便直接地戕賊統一的力量。所以將來『到底』了之後，國家殘破了，元氣喪盡了，可資以統一的中心力量沒有了，剩下的是斷瓦頽垣破磚敗井！是豆腐干塊式的零殘的軍事政治分割！是散匪流寇的到處奔流，是遍野的哀鴻呼號！落後的中國，迎頭趕上，終究還要掉到後頭，這樣一來，中國的進步便要倒退數一百年，將來憑藉什麼機運來復興？憑藉什麼基礎可以產生一個真正的統一？我們只好茫茫問天！如果再憑理智來考察一下的時候，恐怕縱使拖到日本失去使中國殖民地化的力量，甚至整個崩潰，而中國自身仍不免要陷

于第三國的附庸和殖民地的悲慘命運。

所以繼續抗戰的前途，是客觀地存在着這許多對於統一建設大業的危險。我不能丟開民族國家的前提，我便只能如此立論，我不怕人家加我以「民族失敗主義者」的徽號，我便要虔誠客觀地指出這些事實！

這是繼續抗戰與國家統一的利害關係方面。

反過來，再看和平與統一的前途又有怎樣利害的依繫呢？

首先我們能知道：一個次殖民地地位的國家，固然客觀現實需要和平，但實際尋求和平，使和平能保障建設，却正如支持戰爭一樣，是一件艱苦偉大的事業。只有淺識者流才能一見提倡和平，便加之以巫覡式的咀咒，只有浮燥者流，才能一見主和之士，便加之以漢奸國賊的稱號！我們如果揭除這些庸俗的梁山泊好漢式的思想，就國家民族的前途，社會經濟軍事政治的現實狀況來決定和戰大計時，我將浮白而呼，竭聲而叫：只有和平，可以保障建設，也只有和平，才可以使統一偉業，走上一條正確實在的大道：這理由極其明白而簡單：

第一：取得和平，保存已有的國家元氣和力量，使得維繫統一從事建設，以挽救次殖民地的命運。

第二：就國際的形勢日本的態度來看，現在我們可以求取光榮的公允和平，就國內的形勢看，我們還有本錢或力量，可以求致這種和平。

在這裏我要嚴格地指出一件危機和一班的錯誤心理。因為就真實的輿論來看，和平之有利于國家民族的前途是無疑問的了。和平之應該尋求也是無疑問了，但卻產生了一個誰來主和的說法。於是「張之洞不配議和，李鴻章才配議和」的各種謬論出來了。實際這謬論的背後，正藏着一個個人地位和權利之爭。抗戰的起來，是內部勢力矛盾衝突的結果，抗戰的結果，仍然又是這一套，言念前途，不寒而慄！

其實和平既無可疑義的當前救國之道，決不應以議和的主體問題又來掩護着一個內部政治權力的鬥爭，而且事實很明白，實際上已經領導一個壯烈抗日戰爭的是蔣先生能領導一個光榮有利的和平的運動是汪先生，他們個人的政治意見容

或對立，但我們如就國家民族利益來看，蔣先生的抗日適足以爲汪先生求得光榮有利的和平的張本，而汪先生光榮有利的和平獲得，正所以保障抗日的成果而使國家民族得到復興。更就整個中國對日關係而論，抗日主戰者的言行，阻礙其自身轉變爲和議的主體，對日本如此，對中國內部也是如此，又純粹投降或屈服于日本勢力之下的人物或組織，根本上就不配議和，所以事實上只有對內領導真能救國的和平，對外真能力爭光榮有利的和平的領袖，才能議和！才配主和，就這些事實來看，「張之洞不配議和，李鴻章才配議和」的這類個人權利地位之爭的烟幕，決掩不住事實的存在！

現在不是胡鬧的時候了，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決不應在抗戰與議和的這樣大事之下，再玩私人權位之爭的把戲，和平救國的大前提既由于客觀的需要和環境決定了，我們的思想和行動的實踐，便應如此：

(一)思想和認識上在和平運動的領袖之下凝結，一變好尚輕燥浮淺，意氣的頹風，養成深沉果毅謀國老成的理智，自變而變國民，自救并救國家民

族！

(二)行動和實踐上在和平運動的領袖之下結集，政治軍事方面個人或集團的勢力，在和平的大旗之下，推誠相與，團結一致，以兩年來抗戰的精神和魄力來爭取光榮的和平，保障國家民族來日的建設！

事實擺在眼前，途徑亦極明顯，何去何從，我們當該馬上決擇，至於拋棄民族國家利益的前提，抗戰固然要玩個人權位之爭的把戲，議和也要玩這套把戲，把戲玩不得意，就要四分五裂，稱霸稱王。果爾，則抗戰必亡，和平亦不能不亡。中國便鑄成了左亡右亡的命運。這樣一來，縱然一時利用的一個浮淺的民意獲得了民族英雄或好漢的美號。然而亡國之痛，就在目前。誰實爲之？孰令致之？有識的後代歷史家和我們的子孫是決不會蒙蔽而加以寬恕的。

和平防共與復國救黨

當前的黨國正遭遇着兩大危機：一是共產黨的鑽進黨內，以挑撥離間的手段來破壞國民黨和詆毀三民主義；一是中日失去和平，在戰爭的慘痛裏，國家向破滅的深淵墮落。而這兩者之間是互相關連的，共產黨的鑽進我們黨內并利用各種狡獪手段，挑撥起中日間的戰爭，並使其無限制地延長，其目的就是要在這悲慘鬥爭的過程中，使日本疲憊，中國國家與國民黨覆亡，而共產黨則可或徐或疾地擴張牠的蘇維埃政府——第三國際的附庸組織。

擺在當前的危機是兩個：針對危機挽回厄運的國策，也正是兩個：一是用和平來復國，一是用防共來救黨，而這兩個國策，也是互相關連的，要能復國，黨才有她以後的發展的前途，而要復國，又須把已被破壞與麻醉的黨從共產黨的妖霧與迷陣中拯救出來。

現在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任何一個國民黨的黨員，不能忽視這兩個問題，任何一個愛國的公民，也不能忽視這兩個問題，不僅在理智上要深沈考慮，而且要在行動上實際踐行，黨國纔有挽救於頻危的希望。於此，作者孳孳所欲闡明的，即第一是爲什麼復國需要和平？第二要爲什麼救黨需要防共？

第一復國爲什麼需要和平呢？首先我們要就國內的經濟政治軍事等客觀條件來考察，其次是要就國際的地位來估量，把這內外的情勢都明瞭之後，復國需要和平和平可以復國的客觀環境便擺在目前，何去何從，我們朝野的明達與熱誠愛國之士，便不難加以決擇。

就國內的社會經濟組織與基礎而論，作者在「和平，戰爭與中國經濟」一文裏面，曾嚴重指出中國自身經濟基礎與力量之脆弱與外來經濟助力之不可依賴。鐵一般的實相是這樣：

（一）中國的工商業落後，都市方面是在外國商品，工業資本，金融資本的充斥與統治之下，農村方面則在原料品與日用外來工業品的不等價交換之下，

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破壞，加上超經濟的如攤派，增賦，預徵，徭役以及其他苛雜的強制剝削，大眾已經輾轉於死亡線上。更談不到對於一個長期的國際戰爭可以負擔。

(二) 科學技術不發達，國內資源，不能應用近代工業與科學的技術自行開發並加以製造，仍然要在以原料品與工業品交換的損失形式之下，向外國取得軍需的供給，以從事戰爭。這其間因為工業與科學技術的落後而蒙受的浪費與消耗之巨，將使國家經濟損壞無餘。

(三) 就整個的經濟基礎說，中國本不能支持一個長期戰爭，而東南沿海一帶經濟力量比較充實以及沿長江內地一帶經濟比較活潑的地區，到現在又都淪陷並轉而作了他人控制內地經濟的樞紐。至就西南與西北而論，不但近代國家的經濟基礎完全沒有，即就舊式的農業與手工業生產技術亦極落後。這種區域只能在和平保障取得之後，急速加以建設。作為將來中國經濟復興的基礎，而不能在今日資之來作長期的抗戰。

(四) 內部工商業與科學技術落後，民族資本沒有蓄積，產業沒有發達。金融財政方面便只能落到被人左右的地位，戰前與戰事發生以來的法幣，要靠英國的支持。而戰事發生以來的財政，仍要靠英美的借款。英美之所以願意借款，都之爲了自身利益的打算，如果她的自身利益因爲客觀環境的變化，可以從另一途徑取得保障或須要從另一方面來尋求保障時，那牠馬上便看風轉舵了。而且要知無論如何列強對華的財政援助，根本上並不是企圖使中國將日本打敗，（自然她也並不願意日本把中國滅亡），只是要撐住她自己的利益。所以靠外債打仗，姑假定外債可以源源舉得，勝利有着十分把握的話，然而戰爭勝利結束之時，即就負債一項，在經濟上已足使國家奄奄待斃，何況這些條件都是不可靠的呢。英國前此的財政援助與支持法幣隱定外匯，與現在謀與日妥協和對於法幣外匯價格的支持表示踟躕不前的態度，正是給要把在財政上依賴外力來支持戰事者的一個當頭棒喝。

這是中國自身經濟基礎不能從事戰爭與外來經濟助力不足以支持戰爭的客觀狀態，惟一的道路是：爭取光榮而有利的和平，在和平保障之下，利用國內餘存的財力，人力，物力並利用外來的資本與工業科學技術以從事建設。要知二十世紀的國家如果沒有近代真實的經濟基礎，是決不足以賴立於世界之上的，而經濟基礎的建立，只能在和平之下進行。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尤有賴於此。這是中國經濟上必須用和平來復興國家的客觀需要。

其次是政治軍事方面。本來政治軍事的建設，在一個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國家中，牠的目的全在於維繫和平。使國家得到安定，以便從事社會經濟的建設工作。在未建設之前，牠需要與國之間的和平諒解，以保障牠的建設，既建設之後，仍需要保持和平與諒解，以求健全發展和共樹睦誼。中國的政治軍事建設，在戰前沒有取得這種保障，戰事發生之後，復因建設與組織訓練之不足，表現出陳腐，鬆馳，軟弱，呆滯，零亂，隔離等等缺陷，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些枝節節的技術與組織缺陷我們姑置不論。現在要就戰前以來中國內部政治軍事的

重大矛盾和缺點，略加敘述。使知爾後政治軍事的復興，必須有賴於和平建設。

政治軍事的一個總的缺點。便是沒有建設到統一的政治軍事組織，戰前中央只是一個比較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此外則是割據式的一個個的政治軍事單位。四川是一個，廣西是一個，山西是一個，山東也是一個。甚至每一個人都可以代表一個，而這些分割的政治軍事單位與中央之間，又存在許多矛盾衝突。結果是中央想利用對外抗戰來統一內部並消滅內部的離心勢力，而地方性的政治軍事力量則想藉外力來消滅蔣政權以乘機代起，或保存勢力，加上共產黨別有企圖的鼓動，人民陣線派的無識狂吠。中日戰爭遂在欲戰欲和的狀態之下發展到不能戰不能和的泥淖之中了。本來兩國間的戰爭，是何等嚴重的事態，今竟在這種內部的矛盾衝突之下，使其發生，延長而致不可收拾。使數十年發展出來的一點建國力量消失，這真是不能不使有識之士痛心疾首！

復次是政治組織政治道德的沒有健全，以及軍事組織與戰鬥技術工具之未能近代化。譬如就政治的組織與道德來說吧！因人而設的拚拇枝子機關之雜出，中

央與地方機關之不能有嚴密的直屬系統，鄉村基層組織之毫無基礎。以及貪污營利，重個人而忽公益之風的盛行。充分表現出缺乏近代國家的政治條件。至於軍事方面，軍士沒有近代戰爭的技術訓練，因為工業與科學的落後，又沒有近代機械的化學的武器，只憑血肉來拚，然而血肉究竟敵不過堅強的砲火。驅千百萬人於砲灰之下，猶只見失地，退守，轉移陣地，改變防線，正說明農業國與工業國間的戰爭，實是一幕慘劇。

或者有人以為戰前政治軍事的缺陷在這次戰爭中既已暴露無遺，自然在戰爭進行的過程中正好加以洗刷和建設。「改良政治機構」，「革新軍事組織」的聲調，不是在戰爭初起時就高唱入雲了嗎？但事實上，政治與軍事的根本改革並不是單純的事件。牠與經濟財政力量的發展相依，與工業科學技術的進步相繫，這種建設事業之於一個次殖民的國家，在和平可以保持的時期尚為極端艱難的工作，一旦要在失去了和平國家經濟隨戰爭而破壞的時候來圖謀這種建設，直等緣木求魚！

然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當前唯一的要圖，就是在獲致「光榮有利的和平」，在和平的大纛之下，需要老成謀國的政治家與熱誠愛國的軍事首領的勇敢結合。參加這次高瞻遠矚而富於建設性的和平運動，要這樣，纔能奠定將來政治軍事根本改革的初基。纔能使國家從破壞毀滅的泥淖裏拯救出來！復國只是一個抽象的目的，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有切實保障建設的方略。而中國次殖地位的客觀需要，只有經由和平才能取得切實的保障。

更進就中國的國際的處境來分析，也只有自力覓致和平的一條出路，至多是利用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來獲得和平而已，與中國在地理上經濟上有密切關係而且可以多少希冀得到一些助力的國家，是英美法與蘇聯諸國。但各國之間，均有其自主的國策及其運用國策的各自不同的環境，法國的力量只能附隨英國，而英美對中國的幫助，是純粹基於遠東的自身利益出發的。他們的幫助中國或與日本妥協，概以能否保持他們在遠東的商業經濟利益以爲轉移，在他們的一進一退之間，中國自身所蒙受的損失，他們是並不關切的。而且他們所能幫助的限度，決

不致能使中國將日本擊至崩潰。所以結果除了兩敗俱傷或中國完全顛覆了無結束之外，仍不免要來一個和平的解決。至於蘇聯，無論在東西兩方，都是在極力尋求牠自身的和平保障的。只有慣於欺騙的共產黨與淺識的人們，才希望她在遠東方面出來拔刀相助。但事實勝於雄辯：張高峯事變起了，接着就是和平，庫頁島的爭端起了，接着就是妥協，滿蒙的戰事起了，但我們可以決定這一次的星星之火是不會燎原而將至於息滅的。至於她所揚言對華的援助，甚至於實際的援助，正是牠維持自身和平的正確國策。中日的長期戰爭，無論中國滅亡日本疲憊，都於蘇聯的和平建設有利。中國滅亡，共黨容或滋長，於她是有利的；日本疲憊，無力進攻或威脅蘇聯，於她本身的和平也是有利的。所以她現在正是要以中國人民的血肉來換取她自身的和平。這就蘇聯的國家利益而言，是正確的國策，我們毫不能加以非難。但我們反過來就我們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地位來估量時，我們不寒而慄。我們要大聲疾呼，我們要痛定思痛，我們要指出長期的戰爭，是國家民族的自殺被殺的迷陣，只有乘機尋求和平，用和平來保障復國，國家民族才有生

路，這是前述內部經濟，政治軍事條件與剛才所描述的一個次殖民地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的必需所要求出來第一個正確國策。

第二是爲什麼救黨需要防共而防共救黨成爲第二國策呢？

近代的國家已經超越了中古專制主義的時代發展到了政黨政治的階段，雖或有多黨一黨之分，但無無黨主政之國。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惟一的政黨，她是中國近百數十年來的歷史，社會，經濟，政治諸條件加上國際政治經濟的影響所產生的政黨，復國主政，成爲歷史所給予他的決定的任務。但現在我們的黨，因爲一時迷惑於共產黨陷入於紛亂的狀態了。由於共產黨的鼓惑，黨失了和平建國的正確的路線，使國家陷入戰爭，使十餘年黨的建設事業輕輕毀棄於炮火之中。這是黨的重大錯誤。但有黨的三民主義——在，有黨的賢明領袖與真正了解黨的路線與主義的黨員在，這種錯誤是不難糾正過來。我們現在要用和平來復國，更要以防共來救黨。

我們要防共救黨，我們需要先看共產黨怎樣迷惑並離間我們的黨員，分散

黨的勢力；怎樣曲解黨的主義，減低國民對三民主義的信心。這樣，可使已迷惑的國民黨員及早醒覺，未迷惑的國民黨員，不致繼續受毒，黨纔可以得救。

誰也知道，共產黨是十年來流竄各地的毒蛇。自清黨以後，牠自窮蹙南方到逃竄陝北，自提倡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到劫持蔣先生虛偽地服從三民主義挑起中日戰爭，這過程中，牠破壞了無數的農村，殘陷了百千萬的農民，障礙並毀壞了建國的大業，使民族國家的元氣生機，斲喪殆盡，本來共產黨是他們明知道抗日要失敗的，但必須要堅持抗日到底。爲什麼呢？因爲就他們的觀點而論，民族國家是不要的。民族國家滅亡了，國民黨的主力潰敗了，而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勢力，藉抗日復國民族解放等美名，反可順利地發展。他們又何樂而不聳而抗戰堅持抗戰呢？他們套取了列甯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均衡律共產主義可以在某一國首先勝利的理論，認爲在中國內部某一區域內共產主義有首先勝利的可能。列甯仍然以國以民族爲前提，而中國共產黨的謬論，竟欲在一國內部瓜分豆剖的作起，這樣一來，她們又何愛乎國家民族呢？又何惜乎國家民族元氣的損傷呢？所以丟

開救黨不談，純就復國與復興民族的立場上來講，決非防共不可。

至於對國民黨與三民主義的挑撥與污蔑，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大體的方式我們可以歸納成下列的兩項來說：

第一對於三民主義，他們常冠之以『革命的三民主義』，『革命的民生主義』，或『革命的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等名稱。共產黨並宣稱他們是服膺革命的三民主義。這種名稱，淺見者以為他是對於三民主義的羨美，實際有識和真正了解中國國家民族地位與三民主義的人，誰也可以識破他們的詭計。因為三民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中國近百年來歷史和現實的社會國家的客觀條件所要求出來的。針對這種現實的客觀要求而產生的三民主義，是和平建設的救國良藥。無所謂革命的與不革命的之分，共產黨在國內失敗，窮途末路之後不得不虛偽的表示服從三民主義。但實際牠棄毀三民主義的全體，不時斷章節義的竊取三民主義的一詞一句，冠之以革命的美詞，以掩飾他們的荒謬宣傳。蒙亂我們黨的主義的真相。

第二對於國民黨，上則劫持着蔣，使其無地轉圜而只能一味地抗戰下去，下則把國民黨的黨員、無中生有的渲染出許多範疇。使他們互相離異。如在共產黨及其外層的附和份子所謂人民陣線派者流的報章雜誌之上，便可看到「革命的國民黨員」「反革命的國民黨員」「前進的國民黨員」與「腐敗的國民黨員」等挑撥詞句；在和戰的問題上，又將國民黨分成主和派與主戰派的營壘，在思想上，又強分出「民族的失敗主義」「民族的勝利主義」「漢奸理論」「準漢奸理論」等污蔑的名稱，俱如此類，不一而足，這都是共產黨破壞國民黨拆散國民黨的團結的真憑實相！

我們現在站在救黨復國的立場，我們要嚴格的防共，要把共產黨從黨國的內部肅清出去而加以根絕，我們的主張是：

(一) 在和平的大蘇之下，國民黨員重新精誠團結，從共黨的迷惑中，自救救黨並進而復國。

(二) 恪守三民主義，根據次殖民地國家民族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及其所處的

國際地位，發展並鞏固黨的理論。以正確的理論武器肅清共黨的荒謬宣傳，使其無從假借。

(三) 重新鞏固黨的組織，確定黨的任務與路線，以黨的堅強行動與力量，肅清共黨的流毒。

現在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擺在我們當前的危機是兩個：國的覆敗與黨的破亡；挽救危機的國策也是兩個：和平復國與防共救黨。時機迫切，何去何從，決不容我們的狐疑猶豫。有識的憂國之士與真實勇敢的國民黨員，早興乎來！

戰由國民黨戰和由國民黨和之事實與

理論

一

歷史是不會錯的，國民黨的產生，完全根據中國近代歷史的條件，她的發展，強大，并進而肩負着整個中國民族國家的命運以向前邁進，均係由中國歷史的條件決定着而並非偶然的事情。

中國國民黨的誕生，在海通以後中國已經向次殖民地轉化的時期，所以中國之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國民黨不負責任，而欲挽救這次殖民地的命運使成爲近代獨立平等的民族國家却正是她的任務。

次殖民地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是複雜的陳腐的，她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極端險惡，而且到處都可以觸着侵略的魔手的。所以國民黨於此，對內要與舊的封建

勢力鬥爭，要與無知的盲動勢力鬥爭，對外又要與侵略的各種勢力鬥爭，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之中，國民黨所遭受的艱辛和挫折，所犧牲的血肉與精神，是人所共睹的事實。自然，在這種困難艱苦的過程中，國民黨有時要犯着黨的路線的錯誤，黨員要犯着個人行動的錯誤，以致影響於社會民衆，也是難免的事實，我們站在黨的立場，承認錯誤并嚴格的加以糾正，同時站在黨的立場，熱望着全國民衆，了解次殖民地內部外進環境之險惡與國民黨所負任務之艱辛，加以廣大的支持與平心的寬恕。

國民黨執政以來，在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偉業上，已經有巨大的進步，統一的大業也漸次近於完成，但不幸中日戰爭的爆發，使國民黨在維護民族國家的獨立平等的任務上，不得不挺身作戰，因而建國偉業亦不得不半途遭受挫折，兩年以來的艱苦奮鬥，使民族力量得到儘量的發揮，使國際上對於中國民族不得不大加敬信，而尤其使敵方上下，亦不得不承認中國民族力量不可屈伏從而要與中國的新生勢力釋嫌言和，這固然是由於民衆的共同努力，但國民黨的堅強組織和

指揮行動，是決定的作用，這種事業，決非國民黨以外的黨和勢力所能擔負。譬如共產黨是自稱爲抗日前衛并要爭取抗日的領導權的，但事實上對於偉大的國民黨的力量，不得不加承認，而對於自身，只能在承認國民黨力量的大前提之下，偷偷摸摸的粉飾，所以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報告裏，亦無可奈何地要作這樣的召供：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爲基礎的，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爲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國民黨有它的光榮的歷史，主要的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工農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先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所以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

抗戰離開國民黨不能想像。抗戰的責任，只有國民黨才能夠負荷，這完全是

現實客觀的事實，歷史的社會經濟的條件決定着國民黨爲中國唯一支持國運的政黨，平時沒有一個黨可以與他抗衡，戰時也不能有一個新黨的產生可以代替，所以國民黨已取得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始終是穩定而不能動搖的。又國民黨之所以毅然領導抗戰，是完全基於民族國家利益的，所以等到抗戰已有成效，民族國家的利益可以不用戰爭來保障時，國民黨又以毅然決然的態度從事和平運動。并且由和平的倡導進而至於具體的實踐和平救國的工作。在汪先生的領導之下，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綱，確定對內對外的大政方針，對內努力民主建設，以奠定民生的基礎，對外和平睦隣。以保障國家民族的平等獨立。這又是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之中，國民黨所擔負的一種現實任務。這完全又是由歷史的條件和現實的環境所決定的。事實是這樣：中國既然如前所說只有一個唯一的可以支持中國國運的政黨，在戰前和戰時沒有另一個黨可以代替牠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所以日本要戰，便只能與國民黨戰，不與國民黨戰，中日便沒有戰，要和，便只能與國民黨和，不與國民黨和，便只能找些毫無社會基礎的私人作傀儡

而得不得和的成果，就中國本身而論，國民黨不領導抗戰，中國便只有亡，國民黨不領導議和，抗戰的結果便要流產。中國也只有漫無系列地趨向衰落。這樣，歷史的現實的客觀條件決定了國民黨的任務，國民黨在民族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權宜輕重之後，便都以勇敢的姿態挺身而出了。

一一

一般人或者不免要疑心爲什麼像和戰這樣兩個關於國運存亡的大問題，在前後的時期內都要由國民黨來負擔呢？在這裏，我們要以嚴正的態度與社會科學的方法加以闡明，以消釋一班人之驚異，因驚異之消失，進而竭力支持國民黨的立場和行動，國家民族的利益乃可確保。

第一就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而論，至少在現階段不能有別的政黨可以在法律上政治上取得確定的地位，進而支柱國運，近代的政黨，通常以代表階級的姿態出現，她所代表的階級的社會經濟勢力膨大，她便可進而以革命的或以漸進的手

段，取得法律上政治上的地位。組織政府，對外維護國家利益，對內維護階級利益。歐美有力的政黨大都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以資產階級的基礎支持着黨，黨支持着國家，革命後的俄國，是無產階級的一黨專政，以無產階級的基礎支持着黨，黨支持着國家，（馬克斯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衝破國家的，斯大林倡導的是一國共產主義，對馬克斯主義是欺騙虛偽，但就客觀現實而論，牠是真實的，所以我說俄國共產黨仍是支持國家的。）但這種事實，在現階段的中國是不能存在的。現階段的中國，是次殖民地的國家。次殖民地國家的特徵，是外國金融資本工商業資本勢力的強大，國家沒有獨立的民族資本和民族工業的基礎，沒有獨立的民族資本家階級，從而也沒有充分的條件可以產生一個強有力的代表民族資本家階級的政黨。有的只是通過外國資本主義國家開設的洋行與其卵育下的行幫買辦階層，這個階層，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商品與農業國家的原料交換之下的私生子，有損國家民族，而不能代表國家民族。即其自身，亦不能有堅定的基礎。所以中國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沒有發展出強大的民族資本家階級，

從而也不能有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政黨可以支持國家的命運，這是中國與歐美不同的地方。至於說到無產階級，則更加沒有基礎。馬克斯主義的所謂無產階級是以工人階級爲核心的，農民不過居於附從的地位。資本主義社會事實上是工人無產階級的母胎，中國沒有民族工業沒有民族資本主義，這個嬰兒便難長成。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既沒有使無產階級生長成熟，并訓練到可以擔負歷史任務的程度，無產階級便沒有脫胎而出和獨力支柱國運的可能，中國共產黨雖然到處流徙，但實際在中國，牠是找不到馬克斯主義所說的社會基礎的。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并不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而是一種左傾的幼稚的盲動主義。中國共產黨的本身，也並不是如馬克斯所指出的產生於都市的工人無產階級基礎之上並代表着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因爲這些條件和基礎，在資本主義沒有發達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是並沒有成熟的。所以實際中國共產黨的形成，只是俄國共產黨組織和理論的皮毛與中國貧農階層的結合。共產黨的組織和理論，完全是外鑲的東西，並無真實的中國社會基礎作其依據，至於貧農階層的存在，秦漢以降，在中國社會史

上是長期的存在着的。在天災流行兵變頻仍或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苛酷的剝削之下，是常被迫或被利用作無知的暴動的，西漢末的赤眉，黑山，白波，東漢末的黃巾，唐末的叛亂，明末的流寇，都是以窮農作基礎的，這不要思想政策只要在幾個簡單的口號之下或一件宗教的外衣之下就可以領導起來而給予社會以破壞的。這完全是歷史的事實，西漢末的劉盆子，東漢末的張角，唐末的黃巢與王芝仙，明末的李自成與張獻忠，都可以領導。現階段中國共產黨所有的中國社會基礎，仍然是沼襲着上述中國歷史上的東西，而不是馬克斯所指出的近代共產黨存在的基礎。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新的內容，只有外鑠的組織形態和盲動思想，除此便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了無二致。共產主義是必須建設在極高度的工業基礎之上的，歐美資本主義與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尙未實行共產主義，俄國已行的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採用經濟政策，實行社會主義，所以共產黨之於中國，并無革命的作用，由於牠的盲動與破壞，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不得加速地走上工業化的道路，牠的本身倒是革命前途的障礙，這樣的黨，是決不能支持國運而肩負着和

戰的大責的。所以事實上，中國社會經濟的客觀條件決定着只有中國國民黨才有這樣的力量，這完全是歷史的任務，無可逃避的現實事件。

二一

在這裏，我們要問：爲什麼只有國民黨可以擔負起這種責任？國民黨在什麼基礎之上產生這種力量而又必須擔負着這一歷史的任務呢？

如前所說，現階段的中國不能產生強有力的資產階級的政黨，同時更不能有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的現實的條件與客觀環境，需要一個對外能代表全民族國家利益，對內能調和全民族國家利益的政黨，國民黨就是在這樣內外需要的條件之下產生的政黨，牠的所以能夠發達強大并進而在法律上政治上取得唯一的地位的緣故，實即因此。所以就國民黨的本質而論，完全是一個民族性的政黨。這事實純粹是由中國社會國家的基礎和條件決定着的。我們就下列的兩項來分析，更可證明次殖民的國家必須有民族性的政黨，而一個政黨要在次殖民地成

爲唯一強大的政黨也必須具有這種性質。

第一是次殖民地國家內部階級對立的形態不甚顯明，而且沒有一個階級具有特別的力量可以支持國家，如在二節所說的資產的政黨以至無產階級的政黨，都在中國不能取得主導的地位。便是事實。這完全是次殖民地的特殊的歷史的社會經濟的條件所範圍出來的特殊形態。事實上在農村方面，大體只有小地主與佃農貧農的差別，而在外國工業商品之侵略之下，遭受着同樣的命運。都市方面，大體也只有小工廠主與工人，店主與學徒的差別，大部大工廠的經營和資本，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操縱於外人之手，所以事實上中國的工人階級是直接間接地和外國資本家階級對立，不但工人，如果不是買辦階級而是民族的小資產階級的話，牠的地位也是和外國資本家階級對立的，一方面由於產業的落後與整個經濟發展的遲鈍，階級的分化沒有明顯，沒有在民族的內部尖銳的對立起來，另一方面，在對外需要抗禦外國資本主義侵襲的條件之下，各階級又需在民族國家的前提下，統一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國民黨是由各階級間的有用和知識份子的共

同結合而產生的。牠由各階級產生，而不單獨代表各階級利益，次殖民地國家內部各階級的利益既在民族國家的前提之下統一着，國民黨便以挺立的雄姿，代表民族國家利益而從事奮鬥。提倡民族主義，對外要求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平等，對內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就次殖民地歷史的社會經濟的條件以及國民黨奮鬥的必然目標而論，無疑的，國民黨是民族性的政黨。

第二是次殖民地國家內部階級間的利益衝突沒有尖銳的對立。這是與上述階級沒有明顯對立的形態互為因果的。不但沒有尖銳的對立，而且就上述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而言利益還是一致而且還需要在民族國家的前提之下統一起來，所以在民族國家內部縱有各階級間微弱的利害衝突，然而在民族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在必須取得民族國家利益才有階級利益的次殖民地的現實客觀條件之下，各階級的本身不需要單獨有一個黨來爭取各自的利益，所需要一個代表民族國家利益的黨，由各階級的前進和知識份子產生，而又站在各階級之上以調和各階級的利益。因為前者的結果，必然的要損害民族國家的利益，從而自身的階級利益

亦不能獲得；而後者，則兩相益而不相妨。結果是調和民族國家利益。在這種客觀要求之下，國民黨又嚴正地以民族性的政黨出現了，她提倡民權主義，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使任何階級任何個人都有政治的工具可以維護他本身的利益，她提倡民生主義，用生理的和平的經濟政策，從事建設，調和各階級的利益，並企圖在生理的和平的建設過程中，有計劃的消滅各種階級間利益所以衝突的因素，並進而消滅階級。所以在現階段，階級利益是由次殖民地客觀條件的規定在民族國家利益的前提之下矛盾地統一起來（這矛盾如以前所論是極微弱的），但到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建設完成之後，階級的利益沒有存在，連階級的本身也不存在，這時便只有民族國家的大融合了。所以就次殖民地內部階級間利益沒有尖銳的對立，客觀環境需要階級利益調和不需要階級利益衝突，各階級不需要各有黨也不能各有黨來相互鬥爭的諸種事實來考察，就知道只有國民黨才是中國歷史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所規定的黨，只有具有民族性的國民黨，才可是擔負着這個歷史的任務。

就上列各方面的條件來考察，無疑的，本質上，國民黨是一個民族政黨。

四

因爲國民黨的本質是如此，而客觀的中國民族國家的外部內部的條件又決定着國民黨的歷史任務，使其不得不艱苦邁進。所以國民黨之成爲中國唯一大黨而必須全力支持着國運，並不是偶然的，是國民黨必然的命運，同時也是中國國家民族必然的命運。無可推委，現在當前的一個問題，是和戰問題，我們知道了國民黨的本質與中國外部內部的客觀事實，便可知戰由國民黨戰和由國民黨和的一貫的事實和理論了。如前所說：國民黨是民族政黨，對外是爭取民族國家利益對內是調和民族國家利益的，所以戰可以保全民族國家利益或必須戰來保全民族國家利益時，國民黨便挺身而戰，和可以保全民族國家或必須和來保全民族時，國民黨便挺身而和。國民黨只有因時間與外部內部條件的變化而易其政策，決未曾離民族國家利益的大旨，譬如共產黨則不然，抗戰起來，牠極力的要爭領

導權，但實際不過盡搖旗吶喊之力，等到抗戰有了成果，需要用和來保障這成果的時候，牠仍在搖旗吶喊的要抗戰，因為本質上牠是一個外鑠的東西，牠不代表民族國家的利益，民族國家殘破或衰亡了，牠仍然可以發展牠的蘇維埃，牠又何必樂而不出此呢？所以和戰之於共產黨，便不是民族國家的事情，而只是共產黨利用以發展其自身的工具了。

自然國民黨是有牠過去的錯誤的，我們站在黨的立場，虛心的承認，并力求改正，但國民是有牠過去的功助的，廢除帝制，打倒袁世凱，并摧毀軍閥與封建勢力，這也需要黨外人士平心的承認，一個已經淪於次殖民地的國家民族，整個的國家民族便是極其衰落的，在這個整個衰落的國家民族基礎之上所產生的黨，自然也不免要陷於微弱。客觀事實的需要，是要在微弱之中求強大，在衰落之中求復興，黨要如此，國家民族也要如此，黨與國家民族相互的目標，也要如此。這一點，我們誠心地盼望全國上下加以深省。

從抗戰建國到和平建國

和戰之於次殖民地的中國，是一盾的兩面。牠的共通目標，是保障民族國家的獨立生存和領土行政的完整自主。二者之間，只有方式的不同，沒有本質的差別。戰是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採取犧牲的途徑，用血肉來達到上述的目標，而和則是採取外交的方式，俾犧牲血肉的成果不致流產，而使上述目標同樣的達到。中國是一個弱國，一貫的期望是和平，和平未絕望時應力求維持和平，和平被破壞時應力求恢復和平，而戰爭則不過是一種應付變態的不得已的手段。所以「和」「戰」的本身沒有是非，只有因時間的推移所引起的客觀條件的變化，才能決定和戰本身的價值。

中日戰爭已經兩年多了。由於中國的英勇抗戰所表現的民族意識和力量，不但使世界震驚，即對方亦不得不致其欽敬，近衛廿二日談話有云：「已感觀中國

的更生力量與建設氣運在逐漸升起」。同時，中國亦從戰爭的經驗，知道日本是不可輕敵的。這樣，兩國已由力的對抗走到互相認識，互相尊重，而兩國釋嫌言和的交點亦即在此。

國民黨於此，繼「抗戰建國」的口號而提出「和平建國」的口號，這完全是準確的。當時只有抗戰，纔能保住建國的基地，現在是只有和平，纔能繼續完成建國的工程。在「抗戰建國」的時候，我們要的是在抗戰中爭取國家民族的命脈，在抗戰中發展民主，並且在抗戰中樹立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可是事實上在抗戰中倒加緊了軍事獨裁與個人黨派權位的固執。不斟酌民族國家的利益，濫用抗戰，遂致不但不能樹立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反而將整個的社會基礎陷入于破壞的泥犁。過去，當抗戰是必要的時候，我們主張強化抗戰，以與地人軍人利用抗日反蔣以及共產黨人民陣線派的誤國行動和盲動思想爭鬥；現在到了和平是必要的時候。我們主張實現和平，而又以堅強的態度對一切阻礙和平的勢力鬥爭。我們並且鄭重指出，依賴國際以抗戰與依賴國際以和平，都是要不得的。我們更

同樣鄭重的指出，運用軍事獨裁以抗戰與運用秘密外交以和平，都是要不得的。我們過去主張抗戰對外必須自主，對內必須民主。現在我們主張和平，對外必須自主，對內必須民主。所以我們過去的提出『抗戰建國』的口號，與現在提出『和平建國』的口號，其根本認識是一致的，其努力目標也是一致的。

現在我們的主張已經普遍全國，而且具體的進到實行的階段。中國國民黨已經在滬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對內對外的方針。從黨的復興向「和平建國」的目標邁進。我們現在要大聲疾呼地向各方警告。民族國家現在須要和平已無可疑。我們盼望中央的和地方的軍人，在顧全國家民族的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個人的權位之見應該泯滅。我們盼望各黨派，在顧全國家民族的利益的大前提之下，派系之爭應當泯滅，共產黨以外的黨派，應當是都能明瞭國民黨領導和平運動的誠意而與之合作。我們期待軍人能本其對抗戰救亡的認識，進而為對和平圖存的認識，以抗戰的勇氣與犧牲，為實現和平而努力。我們請求民衆要以理智代替感情，一起奮起，給予和平運動以行動的支持。戰要全面戰，和也全面和。過

去是需要主戰，現在是需要主面和。要這樣，中國的國民民族才能免於劫運。

中國今日之民主與科學運動

中國現在急切的需要兩個運動，一是民主，又其一便是科學。中國對內不能民主，對外便很難獨立生存。內部的政權，成了軍事獨裁的形態。軍事獨裁的政治，是民族成了獨裁者的奴隸，國家成了獨裁者的工具。獨裁者爲着個人利害的打算，是不惜以民族國家的命運來殉他個人的私慾的。因此像和戰這樣的大問題，即令明知國家無力再戰，抗戰的結果已經需要和平。但徒以與私人權位有關，仍不免要把國家民族來作孤注一擲。而不肯暫時犧牲權位從事和平，不肯用和平來替國家民族保存一點元氣。內部民主的基礎既爲軍事獨裁所摧殘，而軍事獨裁者又這樣不惜民族國家的殘敗，這樣下去，國家民族對外的獨立生存，尙復何望？這便是中國當前存在的第一個危機。其次是中國科學的未能發展，一班人民沒有科學知識與科學技術的訓練。因而反科學的宗教式的共產黨與人民陣線派的宣

傳，都成了擾亂社會的因素，在沒有科學技術與近代科學物質基礎的民族國家內部，盲動的共產黨與無知的人民陣線派遂得以乘機煽惑。在當前和戰問題上，他們用沒有科學知識作依據的「長期抗戰論」與「最後勝利論」來蒙蔽和戰的實際利弊，把民族國家的現實前途，寄託於這種飄渺的希望之中，民族國家陷於這種境地，真令人不寒而慄。所以由於科學不能發達，科學知識未能普遍，使共產黨與人民陣線派得時肆其無知狂吠，便是中國當前的第二個危機。這兩個危機如任其繼續存在，國家民族的覆亡，可翹首而待。

國家民族的覆亡是不能不挽救的，挽救之道，便是要除去內在的危機，要除去內在的危機，便要用民主與科學兩個法寶。

民主與科學運動是近代歷史發展的兩個巨大的動力。在中國，這兩個運動還沒有完成牠們的歷史任務。所以這兩個運動正還富具着前進的革命作用。

一切的革命，首要針對現實的目標。中國今日政治的現實狀況既然是軍事獨裁所以民主運動的現實任務，便是打倒獨裁，軍事獨裁者以黨與國殉私，我們要

以民主的精神救黨復國，軍事獨裁者以民族殉私，我們要以民主的精神發揚民族的力量以拯救民族。這便是民主運動當前的任務，從此進而確立民主制度，實行人權主義的全民政治。便是民主運動的終極任務。又中國今日之所以舉國陷於戰爭痛苦的深淵而不能作有利結束的原因，既然是由於共產黨和人民陣線派的無知盲動。所以科學運動的現實任務，便是要以正確的科學知識，掃除無知盲動。使一班淺薄的純意氣的或別有作用的反科學的宣傳，無復爲禍亂之厲階。這便是科學運動的當前任務，從此進而以科學的技術應用近代一切科學的成果，發展工業，促進實業，使中國成爲民生主義的近代國家，并以物質基礎極高度的發展爲依據，促進世界的大同，以人來認識自然制服自然。這便是科學的終極任務。中國現實客觀條件要求民主與科學來實行牠們的任務，歷史的條件也規定牠們的任務，或遲或早的必要完成。

過去在五卅時代，民主與科學思想的提倡，大體還只在文化界裏面兜着圈子。但自此之後，國民黨正式自覺地以黨的力量來提倡并力求實行。雖然因爲中國

過去社會的封建遺存太重，限制着兩個運動的迅速發展和迅速成功，但其滋長之勢，已不復能加以遏抑。這次國民黨黨在國家民族危亡的關頭，召開六全代會。在大會宣言中。珍重地指出獨裁的誤國與健全民主組織的必要。而對於以科學運動來提高求知起信精神。排除盲動思想的這一點，尤孳孳地加以致意，這充分地表明是要以黨的立場和力量來促進這兩個運動。以後中國政治的前途如何，中國建設的前途如何：我們要看我們的黨我們全國上下對於民主與科學的信仰和實踐的程度如何以爲斷。舍此而空談健全政治推進建設事實上是決不會成功的。

